

徐樹錚徐道鄰父子(上)

王覺源

寫這篇文章的動機

作者於中外雜誌第二三〇期，寫了一篇「馮玉祥新傳」。友人劉菊辰教授來書見教，說：「……大作中有一段『據傳張之江奉馮玉祥之命，殺徐樹錚於廊坊……徐樹錚之子徐道鄰，欲為父報仇，控馮玉祥、張之江於重慶法院……不予起訴，也就沒有下文了。』似與事實不甚相符。弟猶彷彿記得，當年徐樹錚被殺，報上盛傳係陸建章之子某，為父報仇。恰好弟案頭置有高蔭祖主編的：『中華民國大事記（世界社出版）』一冊，當即翻到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載：『徐樹錚抵北京，謁段祺瑞執政，並密陳政治方略。』。接着三十日載：『徐樹錚出京，在廊坊被人捕殺，事後由陸承武通電，自承為其父陸建章復仇。』這兩段記述，雖相當含混，也沒有明白牽涉到馮玉祥和張之江。兇嫌其誰，死因何在？（大事記中無續載）似仍為歷史一疑案。吾兄治史最深，其願揭穿此一謎底否？……」

民國十四年時，作者方負爰國外，於徐樹錚被殺之事，雖略有所聞，却不明其詳。事隔數十年，以故印象更不深；但名父之子徐道鄰，過去與作者交往頗密，並得窺讀其先人遺著與其他

有關資料。他每言及乃父被害，有仇可報而莫報，猶唏噓傷痛不已。他說：當年道塗所傳：「陸承武自承為父報仇」者，完全是一種冠冕李戴飾飾之詞。乃馮玉祥、張之江藉口轉嫁於陸的陰謀。陸承武雖有「徐樹錚殺其父陸建章之夙仇」；但徐樹錚之廊坊被害，却不是陸承武親手刃仇，而是出於馮、張之手。馮、張為蒙蔽世人耳目，逃避法律責任，使陸掠得為父報仇之美而已。其時北洋一般政治顯要和輿論界，雖明知兇手為誰，却懼於馮玉祥囂張的氣勢，誠恐口舌賈禍，便皆噤若寒蟬，今日說來，徐樹錚雖有召死之因，却是死得不明不白，作了陰謀政治恩怨的犧牲者。余之此文，祇想消閒性的談談徐氏父子個人活動方面的事。至於政潮及戰爭諸事，歷史已有明確記載，本文且不備敘。但有關徐樹錚的死事，自然不能完全避而不言。藉以答覆劉菊辰教授，並就教於中外讀者。

學兼文武擅於權術

徐樹錚，字又錚，幼號鐵珊，又常自號則林，江蘇蕭縣人。生於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。幼讀書於徐州，具美才，有大志。十三歲中秀才，為縣學生員，十七歲補廩，亦清末夔門之客也。

雖愛讀書，但不喜章句之學。弱冠後，獨獲段祺瑞（號芝泉，安徽合肥，人多以合肥稱之，而不指其名）特達之知，依為記室，甚見倚畀。二十六歲，段祺瑞保送徐樹錚赴日，卒業於士官學校。學兼文武，才氣縱橫，隱為段祺瑞之智囊。謀斷並能，兼擅權術，時有諸葛之目。對政治軍事，尤能高瞻遠矚。下筆萬言，倚馬可待。更有段祺瑞靈魂之稱。秉性謙抑，禮賢下士，尚出乎誠。其唯一不滿於時衆者，則為其專親合肥（段字），若夏壽田之於袁世凱、吳佩孚之於曹錕、楊宇霆之於張作霖。傲視王侯，目無餘子，以致故舊疏離，新知難接。既遭人忌，也遭人恨，乃其一生失敗之主因。

徐樹錚學優則仕，得段祺瑞提攜，便一路扶搖直上。民國五年，袁世凱憂憤暴卒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段祺瑞任國務總理，徐樹錚則居國務院秘書長之職。年不過三十餘，便已列身特任。民國六年，任陸軍部次長。民國七年，北京政府令加上將銜。民國八年，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。十一月，策動外蒙取銷自治，奉派兼辦外蒙善後事宜。此乃徐樹錚一生最得意之舉，亦其最志得意滿之時。威稜遠播，雄略驚人。其一切邊防計劃，也確屬精密周全。後之談籌邊者，頗

多譽其才。及庫倫被俄軍佔領，北洋政府自顧未遑，毫無收復之圖，他的計劃一切便成了泡影。民國九年七月，北洋政府封徐樹錚為遠威將軍，但實已落於閒曹了。其時，徐世昌總統蓋已循張作霖、曹錕的要求，免了徐樹錚職。繼而張、曹、吳（佩孚）聯合倒段祺瑞，申討安福系。段祺瑞組定國軍，復派徐樹錚為定國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。直皖戰爭後，徐樹錚逃赴上海，繼經廣州赴桂林。民國十一年一月，晤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商組孫（中山）張（作霖）段（祺瑞）三角同盟的計劃，向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進攻。未果。十三年經由福建赴上海，遭陰謀陷害，被租界工部局拘禁，迫令出洋。十四年初，段祺瑞不得已，便派徐樹錚為考察歐、美、日各國政治專使。十二月返國，即赴京謁段祺瑞覆命。及見，段祺瑞以風聲不利，促徐樹錚速離去。二十九日，徐樹錚離京南返，三十日晨，於廊坊車站被人扣殺。時年四十六歲，一代英才，從茲永訣。嗟悼者，固不乏人；而稱快者，亦大有人在。遺著有「建國證真」及「文集」「電稿」等。

學生致力著述教學

徐樹錚之子道鄰，名審交，字道鄰，以字行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生於日本東京。五歲，隨親回國入學。幼聰慧，得教師激賞。身材中等，膚色白皙，手神明秀，恂恂儒雅，具美男子型。惟在襁褓時，因保母失誤墮地傷足，致成痼疾。雖竭中外醫治之力，仍未見效，終不良於行，乃其一生的憾事。及壯，雄心亦泯，便專心

為學。同一情形，近代學者潘光旦，在清華大學作學生時代，因故鋸去了左腿。他不以殘廢怠於學，反益奮勵篤行。徐道鄰亦正如是。於其父喪之後，忍痛節哀，民國十五年，赴德深造。民國二十年，得柏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翌年回國，服務於軍、政機構，頗有聲譽，文名亦噪。深蒙先總統蔣公的重視，曾聘為奉化溪口蔣府的西席。中日風雲緊張時，二十四年一月，徐道鄰秉承蔣公所示意旨，曾撰「敵乎？友乎？」一文，發表於「外交評論」雜誌，痛斥日本軍閥，並對日朝野作忠告，法透理徹，詞嚴義正，情文並茂，猶其餘事。在這階段中，徐道鄰撰著很多，惟此文最轟動於國內外。對日抗戰初期，徐道鄰任義大利大使館代辦。中義絕交後回國任考試院考選委員。三十四年四月，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。

抗戰勝利後，徐道鄰為進行「為父復仇」事宜，不敢以私害公，乃於三十四年十一月辭去公職，控張之江於重慶地方法院，控馮玉祥於軍事委員會。法曹皆以時效已過為理由，不予起訴。道鄰審度情勢，亦預知難有結果，不過聊盡子職而已。他常說：張漢卿（學良）有「兩次聽人呼不孝，一生誤我是聰明」自責之語。我也有兩句自恨的話：「終天兩抱恨，平生一未消。」一恨當然是指其父仇未復；另一恨則為其痼疾纏身。因為後者，致難拔劍挺身，以償前者。作者亦常戲慰之曰：前者，仇死百事了，四大皆空；後者，正是天留痼疾養大年耳。徐道鄰應曰：祇好作如是觀了。徐樹錚一生功業，以身統雄師，建業外蒙為最著。魄力之偉大，規劃之闊遠，眾口一詞，

盛業交稱。後來之論外蒙問題者，於徐樹錚作法，頗有微詞。徐道鄰以乃父心血傑作，不容稍有損傷，乃根據家存當時文電資料，用心體察，日夕勤研，發為文章，加以辯駁。所言情理與事勢，皆中肯要。在「獨立評論」（胡適之等創辦）發表後，曾引起各方熱烈討論。胡適在「編輯後記」且說：「徐氏則名父之子，能讀父書。所論足資研討此問題者之考鏡。」這在徐道鄰所編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」中，更能具體見之。

徐道鄰以父仇未報，抱恨終天，從此更淡泊名利，絕意政治，專心致志於著述與教學，以立言垂教為務。來臺後，曾任臺灣大學等校教授。五十一年，應華盛頓大學之聘，赴美講學。前後留美十餘年。六十二年八月，應教育部邀請返國，未久仍回美，隨於是年十二月，以心臟病猝發，逝世於美國西雅圖，享年六十八歲。親朋聞耗，咸為傷感。道鄰為學，專攻法律，著作頗多。採西方治學之術，整理國故，尤具異彩。得先人之遺傳，聰明蓋世，對於文章、詩、賦、度曲及橋牌等藝，凡所涉獵，無不精專。除中文著作外，其英、德文著譯，亦多為學術界所稱道。倘天假以年，其有裨於中國學術者，當更未可限量耳。

合肥門下兩雄鬪牆

一般說來，徐樹錚才氣縱橫，辦事積極，已無可諱。所可惜者，器局未闊，氣量稍狹，時或鋒芒太露，處末流濁世，便不合時宜，難於各方應付。以故同門鬪牆，府院失和，府會不協，都

是起因於恃才傲物，樹敵太多，招人畏忌，不敢接近之故。

民國初年，段祺瑞門下，有並立的兩雄，一為靳雲鵬（字翼青，山東人，山東督軍、陸軍總長），一即徐樹錚。同係段祺瑞的學生，徐以鋒芒太露，常遭人忌。靳眇一目，人稱靳瞎子，為人則官僚氣盛，滿身驕氣。徐、靳兩人，真是半斤對八兩。相處既久，便漸有差等，互不相下。明爭暗鬥的結果，以官階言，後來靳則高於徐；以權威言，徐則大於靳。兩雄矛盾，始終未能獲得統一。段祺瑞以旗下兩巨頭各有專長，初則一視同仁，皆予見重，惟靳較溫和，活動範圍稍廣，徐較激進，僅知忠實一主。稍後，段氏對徐，始終信賴，頗有「不可一日無又錚」之慨。世有「不遭人忌是庸材」的說法，又錚不但遭忌於北洋各派，也見恨於安福同門，尤其是靳雲鵬。錢穆（賓四）教授論歷史人物：「認為人才出於亂世，多於治世。使人愛或使人恨的人，都是具備高度智慧的人」。徐樹錚便是屬於「使人恨」也。「使人愛」的一流。如民國初年，北洋歷屆總統之中，袁世凱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馮國璋都是厭惡徐樹錚的人。當年段祺瑞推薦又錚任國務院秘書長及後欲免又錚之職，合肥則兩次與袁氏頂撞。徐世昌令免又錚之職，立時引起直奉戰爭。徐樹錚強迫黎元洪蓋印，免內務總長孫洪伊職，黎既恨之，馮國璋則更畏又錚如虎。民國八年，馮代總統，必待靳雲鵬組閣，得到合肥確切的保障後，馮氏始敢入京。故當年北洋政府的元首，對又錚之敢言敢作，無不忌之恨之，獨段祺瑞則愛之

重之。平心論之，又錚為人，固多缺失，其為具備高度智慧之人，則為無可否認之事。

靳雲鵬魁梧奇偉，方面大耳，不愧一表人物。惟深染清季官僚習氣。合肥對他，初頗倚重。民國八年，段薦靳為國務總理時，曹錕與張作霖則正在聯合倒段，因曹、張當時都想當副總統，又都不能通過段系的安福國會（又錚包辦），因恨合肥入骨。靳雲鵬既憐於曹、張的聲勢，又與合肥的政見相左，他為權衡輕重遷就環境，則轉而與安福系為敵。從此便更難見諒於合肥。

徐樹錚在直皖戰爭之前，在安福系中，向為激烈派的首腦，靳雲鵬則為溫和派的頭子。時徐已漸失勢，靳則漸漸抬頭，兩派矛盾，亦日漸加深。民國八年，靳雲鵬被薦任國務總理，至不見諒於合肥之後，徐則受合肥之命，秘密建軍，成立四個混成旅，榮任了西北邊防軍總司令，又錚正志得於一方之時，靳則深慶徐遠離京畿，復厚顏向合肥親近，段始終對之若即若離。而靳終未逃過督軍團的逼餉而垮了臺。逼餉鬧劇，曹錕索五十萬，曹銳以茶杯怒擲靳雲鵬；張作霖在京扣押李光啓，靳內閣時需餉三百萬。無所出，則毆打財政總長龔心湛，因龔為皖系的糧臺故耳。

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段祺瑞為國務總理，徐樹錚則任國務院秘書長。徐在國務會議席上，常愛發言，多所主張。時內務總長孫洪伊（字伯蘭，河南人，民初直隸諮議局長），很不謂然。以秘書長非閣員，不過一事務官而已，列席閣議，亦無發言與主張之權，如何能恃勢越權？每面折之，於是大鬧起來。段祺瑞不悅，遂釀成後來免

去洪職的風波。段祺瑞門下，院內鬩牆，既未完全化解，而由內閣所發展之府院不和，亦未稍息。

府院失和終未協調

北洋政府府院之爭，乃常見之事，由來已久。而段祺瑞與徐樹錚又皆為始作俑者。當袁世凱帝制登基時，以段祺瑞任國卿，但又不放心，欲以其機要秘書王式通任院秘書長，藉以監視段祺瑞。但段不同意，必薦徐樹錚充任斯職。因使張國淦（字乾若，湖北人，北洋政府教育、農商、司法總長）晉言於袁。袁雖不悅，自願已漸趨末路，又不敢過拂合肥之意，欲易又錚任陸軍次長。張將袁意婉言於段，段祺瑞聞之憤甚，遽擲其烟斗於地曰：「事至今日，此等小事，猶不放鬆耶？」

黎元洪繼袁項城任大總統。段祺瑞組閣擔任國務總理。黎欲以張國淦任農商總長兼府秘書長。段祺瑞則欲推薦徐樹錚為院秘書長。反請張向黎進言。黎最畏忌又錚，則囑張轉達段祺瑞：「總理提任何事，我都能依。惟此事，斷難答應。」張恐觸怒段祺瑞，未去。轉懇徐世昌出面疏通，徐言於黎，黎仍有難色。徐申而言曰：「公畏又錚跋扈？芝泉（段）已够跋扈矣，多一跋扈何害？吾以為任何事，可不依芝泉，惟此一事，則不能不依。」黎氏默然，遂令發表。

張國淦預見府院必有爭執，乃藉機引退，薦由山東省參議員丁世燾（字佛言，山東人，民初山東諮議局長）繼任。但丁不若張國淦柔和，與徐樹錚則常形成對立之勢。段祺瑞納又錚之言，以

爲內閣制的大總統，惟蓋印於內閣所辦大總統令文而已，一切不當過問。黎元洪則入丁世燾之言，以大總統居元首地位，要政理應與聞。凡送請蓋印之文件，當可詰詢。合肥不悅，遂軍入總統府，專由又錚持文入府索蓋印。徐則態度強硬，屢與總統作對。丁世燾則助總統面斥又錚。世燾以大總統得出席閣議，發表意見，對國務得自由行使職權。倘用人不當，更得拒絕蓋印。此皆爲削弱合肥權力，壓制又錚氣燄的意圖；但府院失和，終未獲得協調。

恃才傲物跋扈有名

段祺瑞固爲跋扈有名的人，而徐樹錚恃才傲物，亦以跋扈見稱於時。丁世燾雖助黎元洪多方設法，以削段權而抑徐樹錚；但徐樹錚之跋扈，却始終未改。北洋政府慣例外省疆吏的任免，由院會決定後，擬具總統命令，送呈總統蓋印發表。某日，徐樹錚親送公文到府，請總統蓋印，中有任命福建三廳長的公文。黎元洪詢三人的履歷，徐樹錚答曰：「總統何必多問，我事冗，請速用印！」黎元洪聞之大愠，隨語張國淦曰：「彼輩目中，安有我耶！」徐樹錚跋扈若此，張國淦自知不可留，即其與辭秘書長的原因。

徐樹錚向段祺瑞提議：四省會剿李烈鈞（字協和，江西人，江西督軍），內務總長孫洪伊極力反對。徐樹錚不待閣議通過，即將會剿電報發出。孫洪伊與丁世燾以徐樹錚太過跋扈，當時皆欲辭職，但未實現。不久，又因平政院組織法案，孫洪伊拒絕副署，合肥怒甚。已擬好免孫洪伊

職命令送府，黎元洪拒蓋印曰：「不合法的命令，我不能蓋印。」徐樹錚親入府催索，無結果，遂成了僵持局面，旋往多人調停，始寢其事。於是黎、段之間惡感日深。同時，國會議員褚輔成等，又聯名提案彈劾徐樹錚，遂致府院之爭愈演愈烈（內容相當複雜，不能詳述）。由孫、徐問題，擴展而爲黎、段進退問題。嗣經徐世昌的調解：「孫、徐同時免職。」黎、段雖得苟安於一時；但府院的扞格局面，始終未解，終成爲後來大政潮的肇端。徐樹錚自係此一公案中最重要的人物，而其跋扈之名，益大著於時。

兩個秀才惺惺相惜

北洋軍後起的人物中，有名秀才兩人，一爲吳佩孚（子玉，山東人，清秀才，北洋政府陸軍總長，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），一爲徐樹錚。吳佩孚開府洛陽以後，更爲人所樂道。徐樹錚雖先子玉而知名；但終不及吳聲勢之煊赫。不過兩人同以秀才治軍，過去從無交往。及曹錕奉命攻湘，吳佩孚以破竹之勢下衡州後，聲名乃大噪。徐樹錚覺得吳爲「真正打手」，欲籠絡之以厚合肥的勢力。徐爲聯絡並鼓勵計，便親訪吳於衡州，並作「衡州謠」以贈吳，詞曰：

「……久聞羣賊相戒語，吳公兵來勢莫禦。吳公何人吾不知，但盼將軍自天下。羣鴉暮謀啄人肉，吳公破賊何神速！癡虜膏血被原野，黠者棄城遁荒谷。斬馘追奔降貸死，吳公之來爲民福。馬前瞻拜識公貌，恂恂乃作儒者服。聞巷無復夜叩門，軍令如山靜不紛。流亡略已還

墟邑，安業猶能庇所親。吾男被兵死郊外，陷身爲賊亦何怪！妻女生歸繞膝行，人間此樂得難再。吳公愛民如愛軍，與愛赤子同慇懃。吳公治軍如治民，情感信藉由天真。在軍整暇不自逸，雍容雅度尤無匹。靜坐好讀易，天人憂患通消息。起居有常禮，戟門斷卒烟容止。筆千管，墨萬定，看公臨池發逸興。香一縷，酒盈卮，時復彈琴自咏詩。老民幼嘗事書史，古今名將誰及茲！昔祝吳公來，今恐吳公去。願似寇君借一年，惘惘此情爲誰訴！爲誰訴，留公住！吁嗟吳公，爾來何暮！」

對吳頌揚備至，吳亦讚賞不已。當時，兩秀才雖有惺惺相惜之情，終礙於合肥對吳佩孚頗有鄙視之態。既談不上段、吳合作之事，徐、吳亦未進作深交。

未久，吳佩孚通電主和，引兵北返。旋皖直戰爭發生，徐爲皖系，吳屬直系，敵壘分明。兩位秀才各私其主，亦從此參商不相交通；但兩秀才之名，此時則已並駕齊驅矣。吳佩孚的文事，多爲功名所掩，而徐樹錚之文才，則始終膾炙人口。兩人雖同以秀才出身而稱儒將。然就功名言，吳子玉以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開府洛陽，威名極盛，自爲徐樹錚所不及。不談詩賦文章，徐樹錚有賈誼治安策之稱的「建國詮真」（民國十年所著），爲發摭政見之作，範圍廣泛，見解深透。所提「外蒙問題」，亦言之有物，尤能發人深省。皆可見其有心文治，實非專講武力統一主義的吳佩孚，可以企及的。故以文學程度而言，徐樹錚則實勝吳佩孚一籌。（下期續完）